

引文格式: 冉育彭. 匡时济世与救亡图存: 恽代英“善势力”思想论析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5 (2): 1-9.

匡时济世与救亡图存: 恽代英“善势力”思想论析

冉育彭

摘要:“善势力”思想是恽代英早期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和主张,是他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实现救国救民的理论总结。清末民初,中国陷入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是恽代英“善势力”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其个人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善势力”思想形成的动力源泉。“善势力”思想的形成历经了从“义务论”的萌芽、“互助论”的发展到形成“善势力”思想三个阶段,其过程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逻辑进路。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这一思想既是恽代英实现救国救民的方法和手段,同时也是其目的和归宿。作为方法和手段,其实质是基于道德伦理原则的改良主义;作为目的和归宿,其要达至无压迫无剥削的“黄金世界”。“善势力”思想的内核与以解放无产阶级大众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共通相融性,从而推动了恽代英朝着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向。

关键词: 恽代英; 义务论; 互助论; 善势力; 黄金世界

作者简介: 冉育彭,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常州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恽代英青年观及其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研究”(20JDSZ3016)。

中图分类号: D2-0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4.02.001

“善势力”思想是恽代英在近代中国遭遇国家和民族危机以及社会转型情势下对于改造国家和社会的一个基本政治思想观点和主张,是恽代英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一个较为集中和核心的话语表述。然而,目前学界对此却几乎没有关注,研究成果甚少,至今还尚未有对此进行研究的专题论文。李良明等在《恽代英思想研究》中,把其作为恽代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而有所提及,但没有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1]。鉴于此,笔者拟对恽代英的这一思想观点做一论析,以探究其形成的背景、逻辑进路及所蕴含的本质意义和价值功能,以此探究其与恽代英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内在联系,进而窥探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心路历程。

一、恽代英“善势力”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动力源泉

恽代英“善势力”思想是在国家社会的现实处境和恽代英基于自身成长经历的个人体悟两者相互影响和作用下而生成的。就国家和社会的情状而言,20世纪初的中国业已在帝国主义列强半个多世纪的联合蹂躏之下彻底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性质和地位。中华民国的成立,不但未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和平与安宁、

民主和自由,反而使其陷入了党派纷争、封建复辟、军阀割据(背后倚赖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等相继的丑剧和闹剧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就连孙中山本人在1923年的一次演说中,也不无痛心地说:“辛亥年革命推翻满清、创造民国,一直到今日,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关于民国的幸福,人民丝毫都没有享到。”^{[2]523}正所谓,“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2]116}。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说得对,“中华民国在事实上深受中央政权衰微之苦,而中国现代的爱国志士除了继续处于不平等条约下难以忍受的次殖民地地位外,还进一步蒙受了政治动乱的屈辱”^[3]。这充分说明了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现实的黑暗和混乱:一是中央政权的衰微而导致的地方军阀割据的加剧;二是帝国主义列强继续操纵中国,中国毫无独立自主地位、人民毫无自由民主可言。李泽厚把这段历史说成是一个“悲惨的胜利”,他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政权的实质,却由于甩掉了一个作为权力中心象征的清朝皇帝,反而造成了公开的军阀割据,内战不已,人们的生命和权利连起码的保障也没有,现实走到了原来理想的反面。人们所追求的自由、平等、民主、独立,这些天真的理想宛如春梦一般地消退,留下来的仍然是多少世纪的封建妖魔以各种变相不断出现^[4]。一句话,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辛亥革命悲惨地失败了”^[5]。

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恽代英和同时代的先进分子一样,从来就没有停止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和道路的脚步。面对家国忧患,山河破碎,忧国忧民之心和爱国救国之情成了他探索真理和道路的内在动力和泉源。1895年8月,恽代英出生在武昌,时值清王朝被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而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随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些影响已深入中国腹地,恽代英从小目睹满目疮痍、遍地狼烟的荆楚大地。当时的汉口,沿江一带租界林立,列强的军舰在长江上耀武扬威,横冲直撞,而腐朽的清王朝却毫无招架之力,任由列强摆布和宰割。所有这一切都撞击着恽代英幼小的心灵,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6]119}。因此,旧中国内忧外患的生存危机现实的逼促,加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使恽代英逐渐在心中种下了爱国主义的思想种子,这一种子在辛亥革命后的一系列内外情势下萌芽和发展。这种爱国主义的情感成了恽代英立志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和道路的力量泉源和精神动力。对于爱国救国一事,恽代英是念兹在兹如一日三餐,时刻不忘。他自勉并提醒其周围的友人:“对于国事不可旁观亦不可徒存悲观等,亦社员所每饭不忘者也。”^{[6]120}对于需不需要救国、应不应该救国,恽代英义正词严地指出:“谓国家不须救,非冥顽不灵者,必不道此语也。谓国家不应救,非丧心病狂者,必不持此论也。”^{[6]121}那么,要如何才能实现救国呢?针对当时中国的时局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并在吸收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基础上,恽代英在救国救民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善势力”思想,以此作为他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实现匡时济世和救亡图存的基本思想主张。

二、恽代英“善势力”思想形成的逻辑进路

恽代英“善势力”思想不是单纯基于理论的构建而冥思苦想出来的,而是他在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过程中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印证下逐渐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历经了从“义务论”的萌芽、“互助论”的发展到最后形成“善势力”思想三个阶段,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逻辑进路和恽代英知行合一的品格风范。

（一）“善势力”思想的萌芽——义务利他伦理原则的“义务论”的提出

面对旧中国“半亡国”的社会现实，恽代英在学生时代就立下救国救民的心志，是一个追求爱国进步的新青年。他曾坦露心迹说“要求将来幸福，一定应在社会上求”，并认为自己是“最便于做这完全为社会牺牲的事”，自己“后半生的事业，却便如此的决定了”^{[7] 106-107}。从小的聪颖、民族的危难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得恽代英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关注国事和世事。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有名无实，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际社会更是天下大乱，1914年爆发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此，恽代英从人伦道德的角度提出了他匡时济世的“义务论”思想，公开反对权利论，力主义务论。1914年，还在上大学的恽代英就写了《义务论》一文，并发表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期刊《东方杂志》上。恽代英对此文的发表颇为自豪和得意，认为是“投稿之一新纪元”^{[8]369}。在这篇文章中，恽代英把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善恶观、大同思想和西方无政府共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观念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义务论思想主张。他在文章中主要表达了以下观点：一是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立的。“权利论为易行，而天下未必治，则易行无益也。义务论为难行，而天下可以日治，则难行无害也。”^{[8]5}二是权利是天下争攘的泉源，而义务则可以利人类而作福全世。他说：“权利论者，天下争攘之泉源也。”天下争攘而形成的所谓文明，“徒为罪恶之渊藪而已”。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世所谓文明者，巨大之军舰也，猛烈之炸弹也”，“杀贫贱以利富贵者也。所利之富贵，即他日鱼肉侮弄贫贱者之人也”^{[8]2-3}。三是义务论是人类通向“黄金世界”的道路和桥梁。他劝勉世人，如果大家都“服膺于义务之说，则私产制度，不期而自破，黄金世界，不求而自现矣”^{[8]5}。

从恽代英的这些观点来看，他此时的政治思想显然还带有明显的空泛的道德说教意味，颇具空想色彩。在争攘纷乱、军阀割据的现实情状之下，他的义务论主张无异于痴人说梦，对牛弹琴，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义务论思想充满着对争权夺利的野心家、帝国主义列强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充满着对祖国及其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沉热爱。恽代英以此反对帝国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以权利为幌子，进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贪婪本质的爱国主义立场是鲜明的。在当时很多人还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充满向往的时代语境中，恽代英就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这凸显了其思想的洞见性。义务论虽颇具空想色彩，但对于激发时人的爱国之心，启迪人们修身行善，救世报国，反帝反强权，进而帮助人们看清资本主义文明之黑暗面以及摆脱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以探索救国救民之真理，起着鞭策和思想启蒙的积极作用。

随后，在义务论基础上，恽代英进一步阐发了他的义务利他伦理思想，积极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而鼓动呐喊，在此过程中，他成为华中地区著名的青年运动领袖。如在《原分》一文中，恽代英认为时局纷乱不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分不明”，在于“分乱”，举国之人，“无上下智愚贤不肖，莫不当尸其咎也”^{[8]36}。人各不同，那么什么才是一个人的“分”呢？要说明此问题，就必须理顺义务和权利的关系。恽代英在此文中修正了自己先前把义务和权利对立起来的观点，吸收了资产阶级的权利观，认为权利是天赋而平等的，是神圣不可侵犯之物。或者说，先前的“权利”是专指与利他相反的人的自私之权利，即自私自利。而此时他认为的“权利”则是人类在生存欲望中所追求的自然的权利，这样的权利与利他还是利己并无必然的关系。按照他的分析，“人类既畏死或不欲死，则无不欲求幸福者，且无不欲求最大之幸福者。求幸福求最大之幸福，乃人类权利”^{[8]172}。但是，恽代英认为权利和义务都应有分限，并主要从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角度论述了人之尽义务是人类生存之必要，是应该的分内之事。他说：“义务者，为吾人欲保存自己，而保存社会，然后生也。义务之最终目的，既不过保存自己，则断无所谓酬报，断无所谓以

权利之大小为义务大小之酬报之理。”因为我们个人是离不开社会而单独生活的，所以尽义务是一种“居群之道”。“吾人舍群亦能不安其居，故将欲保自身，亦必以保群为要义，此吾人所以对于国家社会而有所谓应尽之义务也。”^{[8]38-39}可以看出，恽代英的义务和权利“分限说”既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大同思想和墨家的利他思想，同时，也批判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思想和进化论观点，是一种融汇中西而又有其独特之处的义务利他伦理道德观。

(二)“善势力”思想的发展——自助助人、伺候国家的“互助论”的提出

从伦理的角度来看，义务论思想是一种双向的人际关系，即自我对他者的义务，但就其立论的实质来说，它主要是一种向内的个体道德和修养要求。义务论强调个人品行的修养和道德的完善，吸收儒家传统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伦理观和道德上的善恶观。但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更加纷乱的黑暗现实使恽代英进一步认识到了先前提出的义务论主张的缺陷和不足。挽救社会只靠个人的修身养性和道德上的义务是不行的，其影响和作用有限。因为严格说来，义务论很有些道德严格主义的味道，是一种道德伦理观。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这是难于做到的，在缺乏他律性的制度约束和兵戈扰攘的社会环境中，义务论最终难免流于道德说教的空泛之谈。因此，在义务利他的原则下，恽代英进一步思考匡时济世的方法和手段，不断完善先前提出的伦理道德观。在广泛阅读西方资产阶级人文社会科学，秉持“能欢迎新的，还应该欢迎更新的”^{[9]57-58}这一吐故纳新精神和原则下，恽代英积极吸取了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并融合传统文化的“和善”精神和仁爱思想，提出了“群策群力自助助人”的“互助论”思想主张。

在此思想基础上，恽代英联合友人于1917年10月8日在武昌成立了当时中国较早的进步社团——互助社。从互助社的组织结构及其“群策群力自助助人”的宗旨来看，互助论思想显然超越了义务论的个人范围而延伸到了团体和组织的更大境域。在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恽代英深感个人力量的不足和渺小，因此，他想通过更大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更大的力量，在恽代英看来，就是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组织成相互砥砺，相互帮衬的进德修身的团体。然后再以社员为中心，去组织类似的团体。以此类推，犹如水之涟漪，渐次层层扩大，从而达到相互帮助，相互影响，最终实现自我和他人道德修养的提升，进而实现匡时济世和救国救民的目的。所以，互助社的成立绝不仅仅是个体道德人格的完善，而是应对国家和民族危机的一种策略选择和行动逻辑，“更是为了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10]。

清末民初，尤其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企图通过组织团体和会社来改造国家和社会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所普遍采用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手段。尤其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他们救治攘乱纷争社会的解决方案就是“建立‘社会组织’，作为新的人性成长的基点。在他们的自我表述中，各种‘劳工组织’‘劳工学校’和自治团体即是这些‘社会组织’的一些形式”。他们通过建立这些组织以期给社会“提供一种承诺，即不仅在抽象的意义上改变思想，还要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引起激变”^[11]。根据恽代英日记的记载，他也曾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1913年，他年仅18岁时，便“开始接触安那其主义”^{[12]10}。只不过，作为一个非常有思想性和独立性的知识青年来说，恽代英并不是囫囵吞枣地信奉任何一种主义和思想。对于安那其主义，他就是“取其精义，……务取世人易于服从，而暗消安那其之一切阻力”^{[8]283}。

恽代英在研究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取其“互助、劳动”的精义，结合先前提出的义务论思想，他逐渐地意识到“仿学校青年会法”，组织一个兼具“修养”且能够“为社会服务的团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6]113}。恽代英的这一想法来自他与武汉基督教青年会的交往。在与青年会的接

触和交往中，青年会的查经和组织团体的方法对恽代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1917年8月下旬应武昌青年会的邀请赴庐山参加夏令会活动后，他对青年会有了更深的了解。夏令营结束回来后，恽代英颇有心得地总结了七点获益体会，诸如“颇明耶教真义”，“颇得真可与为友之数人”，“观彼中祈祷、查经之效，而悟一日三省之必要”^{[13]142}，等等。十来天的活动对恽代英的个人修身、组织及社团活动等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庐山归来后，恽代英即与好友发起组织成立了以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互助社的成立既是恽代英义务论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也是他吸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资源，尤其是受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和基督教青年会的直接影响的结果。互助社即是“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6]113}。但是它的活动形式，诸如每天要开一次议决会议（半小时到一小时），每次开会时首先静坐五分钟，然后各人报告自助助人之功过，事毕诵《互励文》后散会，散会时数息一百次，等等，均与基督教做礼拜时的祈祷、读主祷文等有类似之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互励文》的内容，其字数不多，共二百二十字左右。虽然，成立互助社的宗旨是自助助人，但是《互励文》的内容明显地超越了这个宗旨，充分昭示了恽代英的爱国报国之心志。《互励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加强修养，自助助人，要以“良心做见证”，“培养自己的人格”，“帮助我们的朋友”；二是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今天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三是要树立决心，爱国报国，我们“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我们的国家“不是没有希望”；四是要避免空谈，力行做事，“当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情”，“从这以后，是实行的时候了”^{[6]119}。很明显，恽代英拟以此为基点，修养自己及朋友的人格品性，通过自助助人的手段以最后达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的目的。也就是说，“助人”不是他们办社团的真正目的，助社会、助国家以致能够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对于互助论，恽代英阐明了它的双重意义：一是对于个人来说，常助人者，其意志自然日高，恶的诱因就不易来。不助人者，其意志自然日卑，恶的诱因自然易来。因此，助人对自己是有利无弊的。二是对于社会来说，“一人不能胜恶势力而欲胜之者，必多结同志友人共胜之”^{[13]364}。所以，他是把“互助”作为养成强大“善势力”以战胜“恶势力”，克服国人一盘散沙状况的主要手段和方法。

（三）扑灭“恶势力”，达至“黄金世界”——“善势力”思想的最终形成

互助社成立后的半年时间，恽代英带领和指导社友以此为基础，积极身体力行，开展自助助人和一些爱国活动，使该社的影响越来越大，社员也越来越多，到1917年年底，就发展到5组共19人。到1918年上半年，互助社的影响突破了中华大学的围墙而扩大到了整个武汉地区的大中学校。形势的发展使得恽代英等人感觉到各校的小团体有必要扩大交际交流，打破学校的界限而组成更大的团体。随后，与之相类似的端风团、仁社、辅仁社、为我社等团体相继成立，从而“促进了武汉地区进步团体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武汉地区的新文化运动”^[14]。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恽代英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先前提出的义务论和互助论思想，提出了“善势力”思想。这一思想的本质特征虽然仍旧是保存了义务论和互助论中的为“善”、为“仁”的精神内涵，但是在外延上，却有了显著的变化。它从义务论的“个人”视角和互助论的“小团体”视域而扩展至大的群体或者说是社会广众，即“势力”范围。因为，在恽代英看来，只有社会形成了众多的“善势力”，才能与“恶势力”相搏斗，并将之扑灭。五四时期的毛泽东也有这样的思想洞见和类似的主张，他也认为补救和改造黑暗旧中国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15]。其实质，也就是要形成一种民众广泛参与的大势力。恽代英的“善势力”思想与毛

泽东的“民众大联合”思想如出一辙,英雄所见略同。为此,恽代英写了《社会性之养成》《一国善势力之养成》《力行救国论》等文章,就为什么要养成“善势力”、如何养成“善势力”等进行了阐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国将不国,对此种情状,恽代英认为,“最要之事,为善势力之养成。而所谓善势力者,必根基甚稳固,能力甚厚大,足以抵抗恶势力,与之奋斗,而能以扑灭之”^{[6]85}。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善势力”的养成和培植离不开社会环境,离不开维系社会的各种关系。对于“善势力”的培植,恽代英认为,人类作为一种群居的社会性动物,养成群居的社会性就至关重要。为此,恽代英在人类的这种自然朴素的生存之道中为其“善势力”思想找到了合情合理的理据。在恽代英看来,旧中国为什么羸弱衰颓,国事纷攘,社会一盘散沙,就是因为没有好的强固的社会性。好人多能独善其身,但是各自独立,各自保守,而没有与他人联合互助之企图。他认为:“吾国惟无强固之社会,故弱,故危,故吾人之生命财产,国家之存亡,种族之存亡,均仰息于眈眈虎视之强邻手中。”因此,要改良社会,建设良善政府,建设社会事业,“舍修养国人社会性,更无由也”^{[8]98-99}。那么,何为社会性呢?恽代英给出了自己简明扼要的定义,社会性“即形成社会最要之原素也”^{[8]98}。那这些“原素”又是什么呢?恽代英从公德、公心、诚心、谨慎、谦虚、服从、礼貌、利他等八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对于社会性的养成,恽代英认为其根本方法在于“发明真理,培植民德”。如何培植民德呢?则舍教育别无他法。而且,他乐观地认为,“以二、三十年教育之力,即足达此境”^{[13]266}。所以,恽代英对教育始终情有独钟,从大学毕业一直到他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致力于教书育人工作,力图通过教育来培植“善势力”以实现他的“黄金世界”。可以说,教育事业是恽代英实践其“善势力”思想的主要载体和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恽代英这里说的“服从”是指服从契约、服从规则,而不是其时一般国民的服从权力、服从权威等奴颜婢膝似的服从和盲从。但从义务论的角度来看,养成社会性的这八个“原素”也可以说都是从个人自身要尽到对社会的义务方面来说的,并无对他者的要求。由是推之,恽代英的“善势力”思想仍然是奠基在其义务论思想之上的,是从义务利他原则为出发点的,而义务利他的基础和泉源则是个人的自我修为和完善。由此可以得出,恽代英对于培植社会性的主张融汇了传统文化的和善仁爱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观,既是对中西文化的一种观照,更是对其的一种扬弃。

如何才能形成“善势力”呢?恽代英认为其基本之途就是:“(一)求友。(二)造友。”这样的话,就会“总教可交的人都被我们交着,可以进益的人亦都得我们的力量,得到他所需要的进益。如此便朋友一天天多,团体一天天大,势力亦一天天大”。对于扩大团体,恽代英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的扩张团体,人人应该盼望做太阳系,教他的周围的人做行星,教这等行星周围的人做他的卫星——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教行星都进而为太阳系,教卫星都进而为行星,再教他们自己还去得他的卫星。如此的轮回促进,总教国内生出许多太阳系,那时才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7]103-104}

三、“善势力”思想的实质及价值功能

纵观恽代英“善势力”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得知,它是恽代英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爱国主义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渐次体现和深化,它深刻表征了恽代英对于实现匡时济世和救亡图

存的美好愿望的执着追求。这一思想在恽代英的整个革命历程及其政治思想主张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首先，“善势力”思想是恽代英早期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和主张，其实质是一种基于伦理道德原则而对国家社会进行逐步改造的改良主义，其目的是实现恽代英心中的“黄金世界”。恽代英从学生时代起就立志要“伺候国家、伺候社会”，并努力在中外各种思想资源中找寻救国救民之真理。从提出义务论、互助论到形成“善势力”思想，这既是恽代英救国救民之理论向度的逐步深化，也是在实践向度上的经验体悟。但其逻辑理路却是基于道德伦理精神而对国家和社会的逐步改良，以渐次实现其心中的“黄金世界”。恽代英的“黄金世界”内涵丰富，外延也随着他思想主张的演变而发展。在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黄金世界”蕴含着“折中取向的道德乌托邦色彩”^[16]，在之后，就是要实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消除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善势力”战胜了“恶势力”的社会，是充满“善势力”的社会，是一种“至善”的社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善势力”和“黄金世界”的话语表述是别无二致的，是同义语。恽代英曾这样表述自己的心志：“我已往、现在、将来，便都是以养成一种善势力为目的”^{[7]99}，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造一个圆满快乐的黄金世界”^{[9]249}。虽然“善势力”思想的实质是改良主义的，但是恽代英从中看到了群体的伟大力量。恽代英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拯救国家和改造社会不是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三五个人的团结就能实现的，而必须靠全社会有“品格”的人团结一致以形成强大的“善势力”才行。然而，恽代英的这一想法和改良实践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等“恶势力”面前根本行不通，“善势力”屡屡遭到“恶势力”的围剿而无路可退。他的立品救国、教育救国、利群书社活动、新村主义试验等均以失败而告终。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恽代英才逐步地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革命道路。

其次，“善势力”思想在促使恽代英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起着桥梁和导引的作用，为恽代英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提供了思想的前提和基础。“善势力”不只是恽代英为实现其救国救民理想的一种手段和方法，也是其救国救民的目的和旨归。作为一种手段，如前所述，它是一种基于道德伦理的改良主义。作为一种目的，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相似相通相融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而庄严地宣告，共产党人是为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实现其利益而奋斗的，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17]。并最终要实现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对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最大的“善”。这与恽代英一贯主张的“利他”“和善”思想和实现无压迫无剥削的“黄金世界”的理想社会是相融共通的。正是这种思想的共通性，促使恽代英在试验各种改良主义而失败之后最终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在“善势力”的导引和驱使下，恽代英后来成立了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共存社。共存社的成立，既是恽代英“善势力”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也是恽代英转向共产主义的标志。也就是说，在目的和归宿上，恽代英为其“善势力”找到了共产主义的归宿，但是在手段和方法上，他剥离了先前把手段和目的合二为一的想法，摒弃了道德伦理型的改良主义，采取了“企求阶级斗争”^{[12]195}的手段。1921年年底，恽代英在摸索探寻中找到了自己心中企望的“善势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劳苦工农大众——之后，就把毕生精力放在以此“善势力”去影响更多的人从而战胜和扑灭一切“恶势力”，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理论、方针和政策。他说：“我们必须靠党的力量，打倒恶势力，贯彻我们的主张。”^[18]就道德伦

理视角来看,恽代英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心路历程映射了五四时期先进分子寻求匡时济世真理的一般规律,那就是基于“善”的伦理,力求把被“恶势力”统治的旧中国救拔出来,以建设一个充满“善势力”的新中国。在探索过程中,在“善”的伦理的导引和现实的逼促下,这些先进分子脱离改良主义道路,转而走上了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解放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革命道路。党的力量、工农的力量就是像恽代英一样的先进分子最终找到和倚赖的“善势力”,共产主义就是他们要为之奋斗去实现的“黄金世界”。

最后,“善势力”既是恽代英的一种政治思想主张,又是他的一种行动践履和实践逻辑,即要联合广众以形成“善势力”。这种“善”与儒家传统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独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独善”思想其本质是注重和强调个人的独自修身养性,保持个人的节操和品行,是儒家对君子慎独的要求和体现。而“善势力”则是以“善”为泉源和基础,以此去积极作为,影响、联络广众之他人,从而形成一种“善”的势力,也就是一种大的力量。恽代英“善势力”思想的形成不是他坐而论道的思想产物,而是他在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相促中逐渐生成的,是其力行救国的实践逻辑的产物。无论是提出义务论、互助论,还是到提出“善势力”思想,恽代英都力戒空谈,反感口说争辩,而注重力行和实践活动。从成立互助社,成立利群书社,创办利群毛巾厂,到从事教育事业、试验新村主义,直至最后成立共存社等,都是他笃实力行以改造国家和社会的举措和明证。他坚信,只要我们大家“将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的真理一一实践起来,勉强自己莫勉强人家,自然人家要感动的,自然社会要改变的”。他在嘲讽无品格的无政府主义者时说道:“无品格的社会主义家,同无品格的孔教徒是一样的不值钱!谁是有品格的呢?你们说要身体力行。这实在最不错了。”并断言,“我们要胜利,只有身体力行一法”^{[7]101-102}。正是基于“善”的理念和“力行”的精神和行动,恽代英在实践中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自己的思想主张,形成了“善势力”思想,并进一步在“善势力”思想的导引和驱使下,最终在比较和鉴别中找到了最能体现“善势力”的代表思想——马克思主义,由一名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参考文献:

- [1] 李良明,王鹏程,李天华,等. 恽代英思想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21-125.
- [2] 孙中山选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3] 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 [M]. 张理京,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205.
- [4] 李泽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241-262.
- [5] 陈汉楚.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 [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48.
- [6] 恽代英全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7] 恽代英全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8] 恽代英全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9] 恽代英全集:第4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0] 徐霞翔. 互助社的起源 [J]. 中国纪念馆研究,2020(1):119-124.
- [11] 杨念群. 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24-27.
- [12] 李良明,钟德涛. 恽代英年谱:修订本 [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13] 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恽代英日记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 [14] 虞建安,李兆娟,汪旭东. 恽代英传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39.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毛泽东早期文稿 [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312.

- [16] 徐霞翔. 青年恽代英与他的“黄金世界”(1914—1920) [C] //谢守成. 纪念恽代英诞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422.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13.
- [18] 恽代英全集: 第 5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304-305.

Rescuing the Country over Crisis and Saving the Nation: An Analysis of Yun Daiying's Thought of “Good Force”

Ran Yupeng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good force” is a fundamental perspective and proposition of Yun Daiying's early political thought, a theoretical summary of his realization of saving the country and people over crisis before he turned into a Marxist.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was plunged into a national crisis that threatened its very existence, which w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formation of Yun Daiying's thought of “good force”. His deep personal patriotism w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its forma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thought of “good force”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initiation of “deont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mutualism”, and its final formation, which reflects the logical way of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Before he turned into a Marxist, this thought is not only the method and means of Yun Daiying's saving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but also its purpose and destination. As a method and means, it is reformism in nature based on moral and ethical principles. As a goal and destination, it is to achieve a “golden world” without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This is similar to Marxism's aim of liberating the masses of the proletariat and all mankind, thus promoting Yun Daiying's transition towards Marxist.

Keywords: Yun Daiying; deontology; mutualism; good force; golden world

(收稿日期: 2022-09-15; 责任编辑: 晏小敏)